

发展社会学的学科危机及范式转换

田毅鹏

内容提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发展问题的日趋复杂化,学科意义上的发展社会学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危机征兆,但危机笼罩下的发展社会学并未进入曲终人散的“终结期”,而是处于一种“转型成长中的危机”阶段。因此,我们应直面危机,努力推进学科研究范式的变革。发展社会学不应仅仅将研究视域局限于发展中国家,而应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其研究界限,以关注复杂的全球性发展现象,增强其学科发展应有的知识厚度。特别是要注意消解发展理论体系内部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由一般性的“原理描述”转变为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案例研究,实现其学科研究范式的创造性转换。

关键词 发展社会学 学科危机 研究界限 范式转换

危机表相及成因

如果以战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出现作为发展社会学学科诞生的标志,那么,发展社会学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并不属于老资格行列。但因其发轫于战后以发展为特征的特殊时代,而理所当然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的显学,并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命题和分析框架,如基于西方经验的“现代化理论”,基于拉丁美洲经验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基于东亚经验的“威权发展论”,基于印度经验的“另类发展”,基于中国经验的“北京共识”,等等,其影响都曾盛极一时。

(一) 危机表相

进入20世纪晚期,随着发展进程的复杂和深入,包括发展社会学在内的诸多关于发展的分支学科都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危机征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知识界即开始注意到发展社会学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一些学者认为,“尽管‘发展’一词在语义群

中具有核心位置,但同时,又极少有词汇像它一样如此无力,如此苍白,以至于无法表达思想与行为的实质和内涵”^①。对于危机的理解也充满了学术争论,发展社会学虽然经历了多次理论转型,每一次转型都试图克服既有范式的不足。但这门学科现在却开始走向一种理论和概念创新都趋于枯竭的境地,表现出无力超越旧有范式,无力适应当代世界秩序的变化等困境。

同时期,作为欧美资本主义阵营对立面的前苏联的学者也针对欧美学界把持的发展学科及其话语提出尖锐批评,其观点虽不无意识形态论争色彩,但其中亦包含着一些关于学科发展的洞见。他们认为“发展社会学是在形成过程中由起决定作用的思想理论依据预先注定的。当前的危机是由那些在其一开始从结构职能论的大理论方面就把发展社会学看成是一门中间理论所造成的。阐述大理论社会模式包括不了的那些社会构成。发展社会学的目的就在于查明这些反常现象并找到消灭这些现象的途径。这种提法已在自身留下了方法论矛盾的隐患。结构职能论的代表人物借

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概念,却没有理解旧理论的内容特征,他们只使用了这一历史概念的外形、模式,而抛弃了其理论上的依据。”^②“要树立历史过程的社会学新概念,需要的并不只是发展社会学观点的调整,而是要改变宏观社会学自身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基础。不解决这一问题,必然导致发展社会学的解体。”^③

相比之下,中国学术界对于发展社会学困局的理解和认识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因为中国当代意义上的发展研究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发端的,几乎在同时,社会学也开启了其学科重建的进程。在此背景下,发展社会学一度成为社会学学科体系内的“显学”。当时的中国堪称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时代”,各种有关发展的理论和学说备受人们青睐,在大学人才培养体系中,发展社会学亦成为必开的课程,出现了持续而强劲的“发展研究热”。直到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对发展的诸种理论的批判才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发展研究方呈现出明显的危机征兆。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罗列出许多发展社会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危机表相,如长期以来,该学科领域内一直没有产生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一些发展社会学的著作,往往成为关于“发展”问题的大杂烩或发展理论的简单集合,缺少理论关怀和视域整合,对相关学科也缺少影响力和辐射力。在社会科学实证化的发展趋势下,发展社会学因其宏大叙事的研究风格而备受诟病。此外,与社会快速发展运行的实际状态相比,作为学科的发展社会学实际上在理论和学科的发展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发展的实践进程,导致学科理论与现实的发展实践产生严重隔膜。在发展社会学诞生之初期,其素以预测发展和把握未来而著称于世,但在现实中却表现出缺乏预测和理论反思能力等弊端,导致“作为一门以研究社会发展为己任的发展社会学,似乎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位置。无论是对这些变局事先的预测还是事后解读,发展社会学的工作都是很难令人满意的”^④。

(二) 危机成因分析

关于发展社会学学科危机发生的原因,以下

几个因素似乎是不可忽视的:(1)发展主义的式微。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二战”以来颇为盛行的“发展主义”逐渐开始走向衰落。当时,很多名噪一时的发展理论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面前,纷纷宣告失败,丧失了解释力,使社会陷入危机和困顿之中,社会问题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单靠富裕社会剩余财力即可解决,“停滞、高失业率、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环境污染、军备竞赛、抗议政治等等,都没有写在教科书里,即那些宣称向后工业社会、后唯物主义、服务型社会过渡的教科书里。第三世界中如此之多的发展理论的失败也没有写在现代化理论的文字当中”^⑤。可见,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推进,人类对现代化社会后果的不确定性的认识和反思越来越深刻。虽然人们没有因此而否定现代化在推进社会进步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却对现代化前进的路向及其社会后果的估价更加谨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现代化发展趋向的确定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我们关于发展的概念是简单化的、歪曲事实的、机械的、线性的,把事实都归于合理化,让人盲目乐观。然而,与生物发展所不同的是,一切社会发展本身都必然包含着倒退、损失、破坏”^⑥。

(2)后现代理论对发展话语的消解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20世纪80年代,以解构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在社会科学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个体之外不存在一般性的现实。因此,只有个体达成共识,各种政治解决方案才可能奏效”^⑦。它破坏性地改变了工业社会以来种种的“宏伟描述”和经典发展模式。

(3)全球化的影响蔚为深远。以往的发展理论基本上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发展而来的,而全球化则改变了这一切。诚如英国学者莱斯利·斯克莱尔所言,全球化的核心特征在于“当代的许多问题都无法在民族国家层次上,即从国际(国家间)关系的角度给予恰当的说明。而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从全球(跨国)过程的角度去加以研究,在社会学中至少出现了三种竞相媲美的全球化理论与研究模式,它们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世界体系模式、文化全球化模式和全球体系模式”。在他看来,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或文

化的过程,而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位综合发展的过程。^⑧正是这种跨国化趋向消解了发展的基本单位,使发展社会学面临困境。

研究范式转换

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发展社会学所面临的危机已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但我们坚信:学科意义上的发展社会学并未进入曲终人散的“终结期”,而是因当代社会发展进入空前复杂时期,现有的学科分析理论及框架落后于现实发展,从而酿成了一种学科“转型成长中的危机”。故我们应直面危机,努力推进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

(一) 学科定位之迷思及研究范围的拓展

一般说来,学科定位是与其研究对象而确立的。长期以来,学界约定俗成地将发展社会学确定为以后发国家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要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过程及其途径为主要研究对象。可见,从发展社会学诞生之日起,便确立了其特定的内涵和研究范围。“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新兴民族国家”“欠发达国家”“非西方后发展社会”“传统社会”“农业社会”成为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具体对象。由于上述社会均处在不发达的条件下,因而可以说发展社会学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

应该承认,在发展社会学的启动和发展期,将学科研究主旨定位于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现实中也发挥了其特定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学科界限理应随之拓展。较早提出发展社会学应拓展其学科研究界限观点的是英国学者韦伯斯特,他认为“发展社会学不应当仅仅被看成是关于第三世界的社会学”,而应拓展为“世界整体社会发展”,即在“较为详尽地阐述第三世界的情况的同时,也将对发生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工业化、城市化等社会变迁过程进行一般的探讨,并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教育发展及政治变迁等过程加以比较”。^⑨因为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发展绝对离不开发达国家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观点提出后,并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回应。而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首先,自现代工业文明产生以来,整

个人类社会虽然发生了“两分式”的变化,但是就其总体而言,其变化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探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问题时,不可能离开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展开孤立的探讨。其次,全球化的影响不可忽视。在社会学产生时,其基本的研究单位是民族国家。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架构也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体系建立起来的。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发展社会学开始面临体系上的危机和调整,而其学科研究范式也应进行相应调整和改变。

顺应时代的复杂性变化,发展社会学不应仅仅将研究视域局限于发展中国家,而应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研究范围,以关注全球化和地方化背景下复杂的社会发展现象,增强其学科发展应有的知识厚度。在这里笔者认为发展社会学学科的核心研究范围可以通过三个最为基本的学术追问来加以表述:(1) 西欧为什么率先崛起?此研究主题试图探讨“过去究竟是哪种社会力量,驱使欧洲从传统的封建制度,激烈地演变出崭新之社会形态”^⑩,从而对欧洲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过程加以深入研究和描述。同时注意从此进程中引申出今天西方的进一步发展将面临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意味着什么?(2) 包括若干文明古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为何未能率先走向现代,成为早发国家?战后这些非西方国家经历了怎样的社会发展进程?对非西方国家发展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探讨已发展和未发展问题。“探讨什么力量是已发展国家所特有而为低度发展国家所欠缺的,是否就是靠着这些势力才使得前者迅速地迈向工业化?”^⑪用美国学者列维的概括就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和“早期后来者”及“其他后来者”之间的关系。(3) 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转型,包含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转型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苏东剧变后发生的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大规模现象而言的。广义的转型则是指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空前转型和变迁。

(二) 学科理论体系的偏颇及其调适

长期以来,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中一直蕴藏着严重的理论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发展理论体系内部存在的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 其二是西方话语对非西方国家发展进程的宰制。

1. 发展理论体系内部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

作为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为研究主旨的社会学分支学科, 发展社会学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体系性的理论体系及流派的支撑。但值得注意的是, 发展社会学自其诞生之日起, 便一直陷于激烈的意识形态对垒和理论论争之中: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出现了以美国和苏联为主体的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而在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着一个比较开阔的“中间地带”——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为了争取“中间地带”的加盟, 两大阵营竞相开出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 作为示范。在上述历史背景下, “模式”概念自然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作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现代化理论决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学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时, 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关于进步的幻象, 它预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非革命化的。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学说, 现代化理论似乎也成一篇‘非共产党宣言’。”^⑫

(2) 同时期, 美国开始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其对亚洲的区域研究也揭开序幕, 直接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提供对策, 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 “现代化理论浸透着冷战高潮中美国人对自身的某种信念。坚信美国的确处于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的终点。作为最具现代性的国家, 美国认为自己应该可以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追随和仿效的榜样。对许多美国人而言, 现代化理论最终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天定命运’观念, 代表了美国人对本国的优越性和道义使命的自我感受。”^⑬可见, 以发展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 反映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胜利。

(3) 新发展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批判性、破坏性及其与建设性之间的关系。作为对发展主义的批判与反动, 20 世纪晚期新发展主义勃然而兴。新发展主义确立了一个新的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主

题。从社会发展理论因革嬗变的轨迹看, 如果说战后社会发展是在“发展主义”主导下展开的, 其核心主题是后发国家赶超式经济发展, 那么, 20 世纪晚期勃兴的社会发展模式研究则带有明显的“新发展主义”色彩。在反思批判“发展主义”的基础上, 人们开始追问“发展是什么? 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 什么在发展? 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经济增长过程中, 不同的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 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又如何? 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 有没有另类的发展轨道, 能更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⑭但学界在讨论新发展主义时, 却发现其破坏性和批判性大于建设性。由此, 以边缘发展中国家为第一视角的新发展主义便面临着巨大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因此, 解构发展主义仅仅是新发展主义的开始, 而建构其行之有效的另类发展路径则是不可回避的核心任务。

2. 发展研究中的西方话语霸权

在迄今的非西方国家发展研究中, 欧美社会科学的学术观点占据了支配性的主导地位, 而非西方国家却很难对自己的发展历程给出自己的解释, 在西方强大的非西方国家研究的学术话语统摄之下失去了最基本的话语权。诚如黄宗智教授所言“在西方的大多数理论文献中, 无论是维护现存体制的理论还是革命的理论, 中国从来就不是主题, 而仅仅是‘他者’, 它们研究中国与其说是为了中国, 不如说是把中国当做一个陪衬。”^⑮因为自近代以来, 西方即不仅在器物、制度方面握有霸权, 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也居于绝对中心。其将非西方国家挤压到边缘位置, 致使“过去的东方既没有理解欧洲的能力, 也没有理解其自身的能力。理解东方并改变它的是处于欧洲的欧洲性。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就是因为它被包含到了欧洲之中, 不仅欧洲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 就连东方也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⑯。在上述理论解释体系中, 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如获得成功, 便可获得一顶学习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优等生”的桂冠, 如果失败则被斥为命中注定的愚昧, 被归类于“白种人的负担”。因此, 如何在回应西方理论挑战的过程中, 寻找非西方社会的

“自性”形成具有非西方国家本土特色的自我解释的理论体系便显得格外重要。

(三) 模式取向的危机与地域社会发展模式选择

“模式”,一般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循此意义确定的“发展模式”概念,一般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较低级的状态向较高级的状态转化时所遵循的原则、途径、程序和方式等。从分类上看,根据不同的标准,发展模式有不同的种类,如以社会形态为标准,社会发展可分为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以历史演进为标准,社会发展可分为早发内生和后发外生两种模式;以自然基础为标准,社会发展可分为内向型发展和外向性发展两种类型”^{①7}。

由于“社会发展模式”概念产生于“发展主义”盛行的时代,其理念中自然充溢着“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的基调,其主张也更多地强调欧美社会发展模式对非西方国家的标准样式作用。“西欧和英语社会取得成就的水平和制度——即取得了什么成就以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方法——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由此推论,其他社会如果想要赶上西方,不仅应当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且应当采用西方的社会、经济和宗教制度。”^{①8}因此,我们在21世纪初从发展社会学视角直面世界社会发展模式研究这一课题时,不应简单地使用“发展模式”概念,而应该在弄清“发展模式”概念纵向变化轨迹的基础上,对其内涵展开系统而全面的反思和辨析。在“新发展主义”的理念之下的“发展模式”概念,更多地强调社会发展模式的多元性,而反对那种自诩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的理解和界定。甚至有的学者主张用“发展类型”概念取代“发展模式”,因为“‘模式’一词容易引起误解,似乎模式是可以简单照搬仿效的。所以本文宁可使用更加中性客观的概念‘类型’”^{①9}。在类型观念之下,地方性和地域性的概念在发展社会学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在方法论上,在强调社会发展模式多样性的基础上,注意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正如布莱克所言“对于各社会之间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共性和差异等比较广泛的问题,

只能用比较的方法加以考查。现代化比较研究首先要观察在现代知识的进步、政治发展、经济增长、社会流动和心理适应中所发生的空前的变化。它试图认识和理解这些变化,评价世界上各种社会对待变化的不同政策所产生的后果,研究不同的制度传统对变化过程带来的接受能力或阻力。比较方法的应用可以减少种族中心论的偏见。它并不认为当前在先进社会中的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型式必定适用于其他社会,更不认为这些政策本身不会有激烈的变化。”^{②0}

学科新体系构建的路径选择

虽然发展社会学正面临前述的种种发展困境,但近年来社会学界关于发展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歇。尤其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伴随着人类文明走向全球化的进程,自战后勃兴的社会发展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热潮。与战后“发展主义”主导下的社会发展研究不同,此次研究浪潮是建立在对发展主义反思的基础之上,试图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带有“新发展主义”特点,由此,发展社会学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在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进程中,我们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一) 发展社会学与发展研究之间的关系

从时间上看,发展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学术界新产生的专门术语,其所关注的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而是源自17世纪以来的欧洲启蒙思想中关于社会进步、进化的观念,试图对“穷国为何如此贫穷,富国为何如此富足”给出新的解释。^{②1}这是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国富论”。发展研究自其发轫以来,便涉及众多学科,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如发展哲学、发展经济学、政治发展、发展社会学、文化发展、比较现代化等,形成了以经济学为核心和基础的关于发展研究的学科体系。在库珀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对“发展”词条做了如下界定“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组,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分析和解决发展问题,特别是人民所说的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以这种方式组

合在一起的这类学科包括经济学、地理学、政治科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而且,越来越多的技术学科也渐渐地加入进来。”^②

我们在承认发展研究跨学科特性的同时,也应明确意识到发展研究领域内各分支学科分野间的相对独立性,并处理好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避免将发展社会学学科带入一个研究泛化的状态。长期以来,发展研究中“发展”一词习惯上是指一国经济(其最初的经济状况在长时期内或多或少地是静止不变的)获得或保持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大约5%~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长的能力。发展的另一个可供选择的经济指标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这个指标考虑到一国以快于其人口增长率的速度来增加产出的能力,通常用“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和增长率可以从更广的意义上衡量一个人的总的经济福利。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公民能够获得多少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实际物品或劳务。^③而发展社会学所应关注的核心问题则可表述为如何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性”的捍卫问题。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运行已使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宏观的空间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疏的村落何以为继?过密的都市何以成为可能?在个人主义盛行的老龄化和少子化时代,又如何避免“社会原子化”趋向?一言以蔽之,如何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运行的状态下,保持经济、社会的均衡、协调发展,成为发展社会学关注的核心内容。

(二) 理论体系与发展经验之间的关系

一般说来,发展社会学注重宏观的理论构想,包括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同时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方略,与具体的“战略”“规划”“方案”联系在一起,故从总体上看发展社会学带有较强的理论取向,使其学科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原理概括层面,而对具体的经验研究关注不够,未能建立起系统的经验案例体系。鉴于此,我们应努力使发展社会学由一般性的“原理描述”转变为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经验研究,建立起植根于本土的经验案例系统。首先,这种发展的经验必须是植根于本土的。诚如发展

研究的著名学者埃斯科巴所言“对发展的改造必须从检查地方结构开始,因为它们是人民的生活和历史,也就是变革的历史前提。”^④其次,虽然其研究具有本土性,但其经验不应是封闭的,而应建立在开放的系统之中,在与一般理论对话的前提下加以展开。

(三) 西方发展模式与非西方国家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

世纪交替之际,以全球化为背景,非西方国家学术界开始对“发展主义”主导下的西方社会发展模式进行总体性反思,重新审视西方发展模式与非西方国家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其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亚洲”思想以及韩国学者韩相震提出的“东亚第三条道路”。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主要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同时注意文化间的理解和沟通问题,即“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汇”^⑤。沟口雄三则认为“迄今为止的世界认识是以欧洲标准为世界标准而建立起来的,但存在以欧洲标准无法衡量的世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基本上不能套用欧洲标准加以把握的世界,为了从整体上把握真实的中国,必须放弃欧洲标准等既定的判断依据,放弃历史框架或意识形态等,尽可能深入中国的历史文献”^⑥。韩相震也通过随笔、札记、对话和学术论文等方式,阐述其对东亚社会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东亚虽然在“发展主义”背景下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奇迹”,但这并不意味着东亚现代化已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因为单纯地模仿西方发展模式实际上已使东亚社会发展模式面临严重的危机。“东亚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试图超越“西方中心论”和“发展主义”的制约,将东亚的社会发展理论植根于本土。^⑦可见,与战后以来西方理论主导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进程和演进趋向不同,非西方国家在实现“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开始努力将自身的社会发展植根于本土,形成了

一些具有民族文化自主性的社会发展理论流派。毫无疑问,这使得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模式的“自我选择”能力空前提高。

(四) 关于发展社会学学科的现实性和前瞻性之间的关系

与“发展主义”主导下社会发展模式研究的乐观自信相比,新发展主义在其阐发的理论体系中,充斥着“危机”“风险”等词汇,整个世界深深地陷入一种“不确定性”和“末世感”中,而且这种“危机”是直接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深深的忧思。“如果发生了发展的危机,那么这一危机所产生的第一个效果和其他危机中一样,就是使本来已经确定的东西变得不确定,使本来已经清晰的东西变得混乱,而且使本来显得协调的概念内部产生了矛盾,导致发展这一概念也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神话的、贫乏的。”^{②③}因此,作为社会学重要的分支学科,发展社会学既要关注后发国家现实的赶超式发展,同时也应努力增强其学科的前瞻性,未雨绸缪,对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外显的和潜在的问题展开超前式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赋予发展社会学学科以一定的思想力和对策力,为当下的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持。

- ①⑦②[英]范达娜·德赛《发展研究指南》,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9、24、200页。
- ②③[苏]卡普斯京《发展社会学中的新倾向》,《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8期。
- ④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 ⑤[德]沃尔夫冈《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 ⑥②③[法]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458页。

- ⑧[英]莱斯利·斯科莱尔《全球化社会学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 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 ⑩⑪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远流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25、25页。
- ⑫⑬[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版序。
- ⑭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 ⑮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 ⑯[日]竹内好《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载张金媛主编《后殖民理论和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
- ⑰庞元正、丁冬红《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 ⑱⑲[美]西里尔·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5、8页。
- ⑳俞新天《机会与限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条件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 ㉑[美]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引言第1页。
- ㉒转引自庞元正、丁冬红《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 ㉓[美]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 ㉔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409页。
- ㉕《如何重新审视中国——对日本著名汉学家沟口雄三教授的采访》,《文汇报》2007年12月11日。
- ㉖韩相震《东亚“第三条道路”:全球化时代社会学的新视野》,《社会理论》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作者简介:田毅鹏,1963年生,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丁惠平)